

陆龟蒙的隐逸及其与文学的关系

韩云波

唐末诗人兼散文家的陆龟蒙“自以为隐士，别人也称之为隐士”^[1]，但他又确以其文学，卓越地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和抗争。那么，揭示其隐逸与文学的关系，就将是重要的。

陆龟蒙早年积极追求用世，重视儒学“道统”指导下的社会实践。后来幻想破灭，转而寻求独善。虽然不再努力求仕，但他接触到社会的污浊和下层生活的惨状，他更加不能忘怀天下。这时，他以大奇骇俗和拒绝合作表示了对社会的强烈抗议和批判。

由此，他道孤情苦，招致群小相怨。他“命既时相背，才非世所容”^[2]，甚至“既被邻里轻，亦为妻子陋”^[3]。面对这种不被人理解甚至与之对立的状况，他将感情移注于其他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获取独善与超越。

首先是山水和宗教，放浪形骸、礼灵奉真。但《松陵集》的闲适，只有时空空漠无极的感伤和人生无常的喟叹，并未解决强烈的孤独。

愤激之余，他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反抗这种重压。他认识到人际关系已化为金钱与权势，并归罪于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，一度希望以原始的贫困和愚昧来消除这种物化^[4]。但是，他不能将封建的社会体制作为异化的根本前提，他在批判社会黑暗的同时，又只能是幻想贞观之治的封建盛世，追怀简陋的原始人道主义。缺乏现实依据，感情也不能从污浊黑暗中获得解放。

最后，在由士族高门没落为仅占地四百亩的小地主过程中，亲自接触田庄实际生产活动，他才能找到失落的感情。

陆龟蒙晚年的生活，基本上在乡间度过：“甫里先生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人见其耕于甫里，故云。……先生之居，有池数亩，有屋三十楹，有田奇十万步（原注：吴田一亩当二百五十步），有牛不减四十蹄，有耕夫百余指。而田汙下，暑雨，一昼夜则与江通，无别己田他田也。先生由是苦饥，困仓无升斗蓄积，乃躬负畚鍤，率耕夫以为具。由是岁波虽狂，不能跳吾防、溺吾稼也”^[5]。甫里别业在今江苏吴县角直镇，是他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。此外他还有震泽别业在湖州长兴县（今浙江长兴），南望卞峰，北瞻顾山，也经营农业，并且是他在湖州的憩息之所。不远处有茶园：“先生嗜茶菴，置小园顾渚山下，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瓠权之费”^[6]。苏州城外有柴草山：“出吴胥门，背朝日行四十里，得野市曰光福。光福西五里，得土山，……皆薪材……自家至麓，凡二百弓（按：合三百三十米），东北倍高而加半焉，余所置多少如此”^[7]。即今苏州市西光福附近。苏州城内，他虽然有祖上留下来的住宅，但乾符三年以后不常住。

陆龟蒙咸通十一年与皮日休唱和于苏州，情趣之闲适，往还之风流，已与隐者无异。洎乾符中，他以求仕的失败者归居田园，虽风流倜傥、逸怀浩气不改，在本质上却有了不小的差别。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前后期的隐逸等同起来，而须历史地看到其变化。

先让我们来看他前期对皮日休与孟浩然的态度。皮、孟二人都作过一段时间的隐士。皮有《郢州孟亭记》盛赞浩然：“呜呼！先生之道，复何言耶？谓乎贫，则天爵于身；谓乎

死，则不朽于文。为士之道，亦以至矣！”在苏州唱和中，又称赞其“甘穷卧牛衣”^[8]的隐逸品格。而龟蒙和诗，仅一句“孟陈节难移”^[9]，并且更多地是指其文学成就，而不是所谓“为士之道”。

皮日休对自己隐鹿门、渔洞上的经历很是得意。《鹿门隐书》多愤激之词，往往指斥天下，龟蒙因此屡次称赞他对道统的贡献。但皮日休既已中第，过去的隐居生活就只能看成是出仕前的准备阶段；就其性质，也与孟浩然差不多。这时，皮陆二人在这一点上就不是随便能引起共鸣的了。

陆龟蒙最后一次应举因咸通十年停贡而罢，身体也愈来愈坏，正式进入仕途的希望即告破灭。即使后来入幕，高放依旧，仍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卸职归田，他的感情才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同样是对现实不满遭受现实压抑而隐逸，他前期表现的是对沈、谢的仰慕，自我陶醉：“谢才偏许眺，阮放最怜咸”^[10]“我亦休文瘦，君能叔宝清”^[11]。他看到的，多是“曰郊居，则沈约有之矣”^[12]。还看不到与社会决绝的坚定态度。

后期反映的是对陶渊明的企慕：高放，力农，指顾天下于胸中，深修道德于心内。《自遣诗》十七表现了他由幕府到田园过程中的内心矛盾：“渊明未待公田熟，乘兴先秋解印归。我为余粮春未去，到头谁是复谁非？”乾符三、四年间，龟蒙居震泽别业，与湖州刺史郑仁规为文友兼作幕宾。诗云“余粮”，当指幕宾之俸。渊明挂冠飘然而去，我今欲隐而不彻底。到底谁是谁非，表面故作达者，其实内心颇不平静。他希望象文中子那样以自己的学说开辟一个新时代，是以出世为入世的儒学实践理性主义者，是较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。这样，他心中对世界的态度，就有了分寸。如嗜酒但又有节制，“先生始以喜酒得疾，血败气索者二年而后能起。有客至，亦洁尊置觞，但不复引满向口耳”^[13]。扩而大之，他不主张屈原道塞不行时的过分清醒，也反对魏晋人沉醉以远祸而至于自暴的作法：“屈大夫之独醒，应难共语；阮校尉之连醉，不可同行”^[14]。他“宵长拥吟褐，日晏开书幌。我醉卿可还，陶然似元亮”^[15]。沉醉又不乏清醒，为了解决内心出处的矛盾，陶渊明以隐逸追求理想的态度使他受到不小的启发。

那么，他的隐居一方面确实是以理性为指导思想，而杂以隐逸的情趣：“末佩桃艾，敢违仁于一日”，又“况有布緦纶帽，尚足朝昏；羽扇貂裘，犹堪寒暑。得以书抽虎仆，射用牛犢；自理茶租，闲披钓褐。经称小品，还下二百签；赋谓名都，略点八十处。下问得犁涂之义，徐听闻慙怒之诗”^[16]。

同时，由于理想的孤独，在《江湖散人传及歌》等作品中，他又表现着强烈的愤激动荡的情感因素。在异己的社会力量面前，他毅然以“散人”自称“散人者，散诞之人也。心散，意散，形散，神散，既无羁限，为时之怪民。”以致“束于礼乐者外之”侧目。强烈的感情这时以对社会的抗议喷薄而出：“所以头欲散，不散弃羲巍；所以腰欲散，不散佩陆离”，不屑与那些“无端后圣穿凿破，一派前导千流随。多方恼乱元气死，日使文字生奸欺”的奸邪、“奴颜婢膝真乞丐，反以正直为狂痴”的奴才为伍，不屑与整个世界为伍。

“行散任之适，坐散从倾欹，语散空谷应，笑散春云披”，他要从“散”中找到一种自然境界，“外物一以散，中心散何疑”，“不共诸侯分邑里，不与天子专陞陴”，忘我而陶然。

但是，现实是怎样的呢？“金鑲贝带未尝识，白刃杀我穷生为？”“归来辄拟荷锄笠，

诟吏已责租钱迟”。社会黑暗虽无可逃避，可是他又只有在农村生活相对宁静的断片中，才唤起心中对大自然和人生的一限春意，真正欣赏和认识到世界、人生的美好一面。这和对社会的抗争一起，突出地表现在《笠泽丛书》中。

首先，他的作品表现了唐末农业经济的破败和由此对当局的攻击。

当他从对大自然的陶醉中，从对儒学理性的迷狂中清醒过来，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。陆氏累朝簪纓，虽是名族犬姓，但到他一代，早已没落，失去了各种特权和优待。和所有中小地主一样，他也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。他对当局残暴的体验就尤为深刻。

乾符六年，吴兴“自三月不雨，至于七月”，“农民转远流渐稻本，昼夜如乳赤子，汲汲然拯渴不暇，仅得葩坼穗结，十无一二焉。”加之鼠害鳧灾，几至无收。官府却“当是而赋索愈急，械束榜楚，篋木肌体者无壮老”。龟蒙“亲蒙及灾”^[17]，愤而怒斥：“俾生灵之众，死乎盗，死乎饥，吾不知安用取者为！”^[18]这种对现实的批判，贯注于他后期的许多作品，是《笠泽丛书》的重要主题。

但是，由于士族阶层的自身弱点和他尊经重道的思想基础，他的批判往往又带迂腐的教条色彩，他的武器仍然只是儒家“仁”学精神。如《记稻鼠》即以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作为批判依据。不仅如此，还常常因无力于现实而转向道家的超脱。《五歌·刈获》写这场天灾人祸说：“天职谁司下民籍，苟有区区宜析析。本作耕耘意若何，虫豸兼教食人食。古者为邦须蓄积，鲁饥尚责如齐余。今之为政异当时，一任流离恣征索。”接着他感到失望：“平生幸遇华阳客，向日餐霞转肥白。欲卖耕牛弃水田，移家直傍三茅宅”。

龟蒙有田四百亩，按当时私家收租的中等水平，每亩五斗^[19]，年可获二百斛。其家“大小之口二十，月费米十斛”，一年尚于八十斛。另外，瓿杖之费及薪材等，皆可自给，本也不算贫困。但在“赋数倍于前，不足之声闻于天下”^[20]的时代，受灾而官府不恤，反而征索愈急，使之朝夕有饥寒之患，“寒不得衣，病不得酒。”^[21]一般农民更不用说，只好流离丐贷，大批破产。这样，批判社会的同时，他以自身遭际反映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和一般农民不堪重压、日趋破产的现状，无疑又是唐末农村破败景象的艺术再现。

第二，生活状况的接近，感情上也日益与农民接近。

《村夜》二云：“世既贱文章，归来事耕稼。伊人著农道，我亦赋田舍。所悲劳者苦，敢用词为讠。只效刍牧言，谁防轻薄骂。……安知勤播植，卒岁无闲暇。种以春闋初，获从秋隼下。专专望穰稔，捐措条桑柘。日晏腹未充，霜繁体犹裸。……若与甞辈量，饥寒殆相亚”。这不是简单的乡居生活描述，是饱含作者悲愤的切身体验。弃幕职而不继，绝征召而不应，田庄收入成为他赖以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。质朴无华、纯真无欺的田园生活就成为他的感情依托。

“古所谓登高能赋者，赋物之恣”，当“金行告穷，日御初九”的深秋，“桐阴雨压乎泥沙，菊气风扬乎户牖，寒无以衣，病不得酒，茫洋于心，噎嗝在口”，稚子劝其登高以道灾告、披郁陶。龟蒙以“惨戚在下，君宁忍窥”、“我中时病，言开怒随；感物憔悴，遐瞻迹噫。是使灾告弥炽、郁陶愈悲”而谢之。他只能回到农业生活中来宣泄感情：“我谷未实，我蔬未肥。弗视农圃，吾将曷归？”^[22]

他亲临劳动现场，“冬十月，余视获于甫里”。^[23]“今来观刈获，乃在松江并”。^[24]由于和农民的接近，农民们也不拿他当外人。在震泽，“故疾未平，厌厌卧田舍中。农夫日

以耜事相聒”。[25]《小雪后书事》更是具有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纯真意趣的佳作，“时候频过小雪天，江南寒色未多偏。枫汀尚忆逢人别，麦陇惟应欠雉眠。更拟结茅临水次，偶因行药到村前。邻翁意绪相安慰，更说明年是稔年。”龟蒙病已有年，行药到村，不免有愁苦之色，而邻翁以农事相慰，“不啻若自其口出”，[26]质朴、真诚而单纯。及情趣由此可见。

农民的生活，也常常引起他的共鸣和关切。《春雨即事》：“小谢轻埃日日飞，城边江上阻春晖。虽愁野岸花房冻，还得山家药笋肥。双屐着频看齿折，败裘披苦见毛稀。比邻钓叟无尘事，洒笠鸣蓑夜半归。”金圣叹云：“此又自写其苦，而言世间方有更苦于我者，相形论之，则复欣慰也。夫屐齿烂折，裘毛褪稀，积雨之恶，实为无量。然而屐折犹可高卧，裘稀犹可拥被。若夫南邻北舍，又有半夜冲雨，发根尽湿者，彼独何人哉？‘无尘事’，言并非官事勾连，死丧匍匐，不过求觅升台，存活妻子，而其艰难之状，已至于斯，苦乐真有何定哉？”[27]平居之民如此，若遇凶年，官府急征，则又何若？陆龟蒙不是“则复欣慰”，而是悲情益苦。从这里出发，一方面他坚决而勇敢地批评统治者，另一方面也常常消极逃避，感到“苦乐无定”。

《五歌序》：“古者歌咏言，诗云‘我歌且谣’，传曰‘劳者愿歌其事’。吾言之拙艰，不足称咏且谣。而歌其事者，非吾而谁？”生活和感情的日益接近，使他部分地承担起了表现劳动群众的历史任务。

最后，从这种感情出发，表现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劳动的美及其热爱与叹赏。

让我们先看看他的《五歌·放牛》：“江草秋穷似秋半，十角吴牛放江岸。邻肩抵尾乍依偎，横去斜奔忽分散。荒陂断堑无端入，背上时时孤鸟立。日暮相将带雨归，田家烟火微茫湿。”这不啻是一幅清远宜人的水墨画：深秋，江岸，草已稀疏；荒陂，孤鸟，略带萧杀。本宜归藏之际，在作者笔下却透出无限生机：十角吴牛，江岸嬉戏，横去斜举，无束无拘。这是一年生产完成之后的休养生息，透出收获的喜悦。不独牛也，结尾以“烟火微茫湿”引田家入画，是人亦熙熙。

他热爱劳动生活，从劳动的瞬间，他感觉到大自然的勃勃春意。这一切和他的生活发生着直接的联系：“十角吴牛”即“有牛不减四十蹄”，“我来观刈获”即“有田奇十万步”。这是养育他的土地，是他生存的基础。“有牛角角，有田棋棋，不值岁恶，未尝孔饥”，值得骄傲：“谨尔沟塍，利我钱镈，聊以卒岁，更俟东作”，[28]足他珍视。“春归迨秋末，固自婴微恙。岁晏弗躬亲，何由免欺诳。”[29]他是那样念于心！

“南岸春田乎自农”[30]他充分感觉到他是这个劳动整体的一分子。因此，他对此十分重视，努力从其中发掘美：“羊侃多应自古豪，解盘金稍置纤腰。纵然此事教双得，不博溪田二顷苗”。[31]即使价值连城，也换不去他已建立起深厚感情的田庄。这里有他丰富的感情。他“在田野间，一日，呼耕叟就而数其目，恍若登农皇之庭，受播种之法，淳风冷冷，耸竖毛发”。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由衷叹赏，并由此深悟“吾不如老农，信也”，并“因书为《耒耜经》，以备遗忘，且无愧于食”。[32]而对这一点，我们也只有以他隐逸而亲农事的生活体验来说明。

他在这里赞美的农业，不是供统治者榨取膏血的“本”；使他由衷赞美的，只能是和他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那些因素，即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赖以寄托的感情渊藪。他从人的物

质和精神的最基本需要出发,由破落士族而“未尝孔饥”,并在其中表现着质朴无华的情感个性,就是这一问题的内在机制。

这种情感在前期是少有的。那时,他汲汲于仕途,无暇感受自然的赐予。只有他立志不出,才感到生存之可贵。这样,它由《松陵集》的闲适到《笠泽丛书》亲农的转变,乃是他后期隐逸生活的光华!它不同于河南尹张全义田峻式的喜悦;〔33〕也不同于举子韦庄“试望家田还自适,满畦秋水稻苗平”〔34〕的兴奋;他是陶潜“园日涉以成趣”、“衣食固其端”真趣的再现。

陆龟蒙从前期尊经重道、应举求幕到后期愤世嫉俗、躬自畚鍤,社会和个人生活遭际已给他的心灵刻下深深的印痕。他的作品不独是个人生活情感的体现,也是大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一个侧面的反映。

首先是唐代士族屡遭打击的烙印。经过元和以来的士庶斗争,庶族地主势力在政治上获得优势;唐末农民大起义则几乎最后结束了士族的政治、经济特权。到宋代,“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,蝉联珠组,世为显著,至本朝绝无闻人”。〔35〕“不复以氏族为事”。〔36〕而早在唐末农民战争以前,士族即已衰微。杜陵韦庄、吴郡陆龟蒙皆宰相后裔,望地名门,其命途却多灾多难。经济上,是不起眼的小地主。韦庄数米而炊、寸薪而爨,孩子死了,裹尸的破席子还要拣回来。〔37〕。政治上也颇不得志。陆龟蒙一生不沾王命,死后十八年才下令追赠;韦庄五十九岁才考取进士。可见其没落衰微。

同时,也正是因为他们流离坎坷,艰辛备尝,才有机会接触到下层社会,体会下层的感情,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感情,和庶族地主在文学上的代表皮日休、罗隐等一起,表现了唐末受压迫者的境遇和心理。陆龟蒙既如前论,兹再举韦庄为例。著名长诗《秦妇吟》代表的是惨遭割剥的下层城市平民、农村自耕农和中小地主。他如“半年辛苦葺荒居,不独单寒腹亦虚。努力且为田舍客,他年为尔觅金鱼”。〔38〕“念尔辛勤岁已深,乱离相失又相寻。他年待我门如市,报尔千金与万金”。〔39〕也不是锦衣玉食、身处富贵中所能言的。

其次,陆龟蒙的作品还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变化中的心理和文学状况。

唐代土地占有形式,中唐以来,庄园经济逐步取代均田制而得到确立。唐代庄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,其内部往往有具备一定设备和程度的分工分业。陆龟蒙的庄园大概就是这种有一定分工的小庄,小鸡产薪,顾渚产茶,甫里产粮。并且,据当时一般情况看,各专业庄内可能还有加工手工业。这就使其在经济上有一定独立地位。另一方面,庄园主对土地的占有不是绝对的,必须向国家提供赋役。并且,由于分工的不完备,又要和市场经济发生广泛的联系。这样,特别是小庄,就较易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,没有独立的地位。

正是这种具有一定独立又不能真正独立的性质,使他不仅能做个野逸之士,还是个隐士;同时,又不能忘却天下,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时时牵动着陆氏庄园的神经。当然,出现这种二重性的根本原因是他思想上的矛盾。但庄园经济的性质则无疑造就了其时代个性。

庄主与庄客的关系形成他作品的另一面。他是庄园主,庄客租佃他的土地,他对庄客来说就是主人。所以,他时有“田峻”之态,顾及输薪不及而能责之:“何数廉而至晚,得非赭吾山而为汝之利耶?”〔40〕唐代庄客同时又具有一定人身转移的自由,可自立为户,对租种的土地,也带一定占有性质。《唐会要》卷八五、《籍帐》:“宝应二十年九月敕:客

户若住经一年以上，自贴买得田地，有农桑者，无问于庄荫家住，及自造屋舍，勒一切编附为百姓”。佃户的这种性质，对经济力量薄弱的小地主来说，经济的人身依附就不是太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主和佃户往往是由于一种习惯感情而长期结合，并且在危难之际，颇有同舟共济之感。虽然他们的阶级属性迥异，但至少在对庄园的生产一点上由于共同的关心而可以获得情感交流。大庄园主财大气粗，没有共同的焦虑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反映在文学上，同是隐者，小地主更多田园诗，表现和农民的亲善关系，如陶潜、陆龟蒙；大地主则更多山水宴游诗，表现贵族的优雅闲适，如司空图、谢灵运。

最后，陆龟蒙的隐逸生活还带来了文学风格的变化。

《甫里先生传》云：“少攻歌诗，欲与造物者争柄，遇事辄变化，不一其体裁。始则凌铄波涛，穿穴险固，囚锁怪异，破碎阵敌。卒造平淡而后已。”龟蒙作文，原来从学问出发，“仆少不攻文章，止读古圣人书”、“我自小读六经、孟轲、扬雄之书，颇有熟者。求文之旨趣规矩，无出于此。”^[41]追求通经而博古。后来这成了他的主要弱点，“胡震亨云：“陆龟蒙江湖自放，诗兴宜饶，而墨彩反复黯钝者，当由多学为累，苦欲以赋料入诗耳。陶潜诗胸中若不著一字者；弘景识字多，吮毫弥拙矣。参三隐君得失，可证林下吟功。”^[42]他的诗赋，确有“填塞古事”^[43]之病，虽凌铄波涛而不能救。然而，他在《笠泽丛书》中^[4]取得的文学成就，的确又是“自成一家^[44]、“特立兴起”^[45]而“亦未易及”^[46]的。而笠泽创作时期，正是他隐逸的时期，他的成就无疑与此有关。乡居的生活体验使他逐步脱去书卷气，将触须伸入现实，同时又保持了“与造物者争柄”的气概，使其作品风格最后趋于平淡，而“于平淡中却极鲜丽”，^[47]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形式主义束缚而获得较好的发展。

综观上述而言，陆龟蒙的隐逸与文学有较大关系，是研究他文学成就的重要出发点。

指导教师 徐永年 林昭德

- [1] 鲁迅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。
 [2] 陆龟蒙《笠泽丛书》（许篈刊九卷本）卷六《自和江墅言怀》。
 [3] 《松陵集》卷一陆龟蒙《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》。
 [4] 参见《笠泽丛书》卷二《书铭》、《蚕赋》。
 [5][6][13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一《甫里先生传》。
 [7][20][40] 《笠泽丛书》卷九《送小鸡山樵人序》。
 [8] 《松陵集》卷一皮日休《鲁望读襄阳耆旧传……次韵》。
 [9] 《松陵集》卷一陆龟蒙《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……再抒鄙怀用伸酬谢》。
 [10] 《松陵集》卷五陆龟蒙《和袭美江南书情二十韵……》。
 [11] 《松陵集》卷五陆龟蒙《奉酬袭美早春病中书事》。
 [12][16] 《笠泽丛书》卷八《幽居赋序》。
 [14] 陆龟蒙《甫里先生文集》卷十四《中酒赋》。
 [15][24]29] 《笠泽丛书》卷五《记事二首》二。
 [17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三《记稻鼠》。
 [18][23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三《禽暴》。
 [19] 参陆贽《陆宣公集》卷二二《均节赋税恤百姓》第六条。
 [21][22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三《登高文》。
 [25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七《自遣诗三十首》序。
 [26][27] 《金圣叹选批唐诗》卷七上。
 [28] 《笠泽丛书》卷二《田舍赋》。
 [30] 《笠泽丛书》卷七《自遣诗三十首》二十。
 [31] 同上九。
 [32] 《笠泽丛书》卷八《耒耜经序》。

(下转51页)

- [45] 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。
- [47][48][49][50] 见《李白集校注》附录四引。
- [51] 叶燮《原诗》，见《清诗话》下。
- [52] 《闻一多全集·唐诗杂论》。
- [53] 苏轼《李太白碑阴记》，见《李白集校注》附录四引。
- [54] 李白《胡无人》。
- [55] 李白《赠张相镐》其二。
- [56] 李白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其二。
- [57] 李白《赠裴十四》。
- [58] 李白《日出入行》。
- [59] 李白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》其三。
- [60] 李白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。
- [61] 李白《登太白峰》。
- [62] 李白《久别离》。
- [63] 李白《望汉阳柳色寄玉宰》。
- [64] 《李白集校注》附录四引。
- [65] 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。
- [66] 李白《书情赠蔡舍人雄》。
- [67] 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。
- [68] 李白《上李邕》。
- [69] 李白《天马歌》。
- [70] 李白《独漉篇》。
- [71] 李白《赠饶阳张司户燧》。
- [72] 李白《公无渡河》。
- [73] 李白《横江河六首》其一。
- [75] 李白《望庐山瀑布》。
- [76] 严羽《沧浪诗话》。
- [77] 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引刘次庄《尘土黄》诗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[78] 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。
- [79] 《唐诗别裁集》。
- [80] 见《李太白全集》此诗后王琦按语，中华书局。
- [81] 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- [82] 《典论·论文》。
- [83] 《与吴质书》。
- [84] 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。
- [85] 《毛诗序》，见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。

(上接36页)

- [33] 参《旧五代史·张全义传》。
- [34] 韦庄《浣花集》卷一《虢州涧东村居作》。
- [35] 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卷二。
- [36] 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三。
- [37] 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六五《韦庄》。
- [38] 《浣花集》补遗《仆者杨金》。
- [39] 《浣花集》补遗《女仆阿桎》。
- [41] 《笠泽丛书》卷四《复友生论文书》。
- [42] 胡震亨《唐音彙考》卷八。
- [43] 同上卷十。
- [44] 《师友诗传录》张实居答。
- [45] 叶燮《原诗》卷一。
- [46] 《师友诗传续录》王士禛答。
- [47] 《中晚唐诗叩弹集》卷一一《窦廷珠评》。